

五四散文选讲



中国青年出版社

44.61
269
1

五四散文选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56级四班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个选本选取新文学最早十年間富有教育意义的、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包括党的早期领导同志李大釗、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的优秀作品，以及散文的著名作家魯迅、郭沫若、叶圣陶等的作品。每篇后附有作者介紹、注釋和講解。前有“前言”，系統地介紹了五四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指出五四散文的意义和成就。

五 四 散 文 选 講

北京大学中文系56級四班編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10 5/8印張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0.72元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目 次

前言	5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	25
鲁迅：“呐喊”自序	33
論雷峯塔的倒掉	45
灯下漫笔	51
論“費厄波賴”應該緩行	65
好的故事	82
从百草园到三味書屋	86
藤野先生	94
紀念刘和珍君	105
瞿秋白：“餓乡紀程”緒言	116
兵燹与弦歌	123
赤色十月	128
最低問題	131
赤俄之归途	137
那个城	151
邓中夏：貢獻于新詩人之前	157
惲代英：耶穌、孔子与革命青年	166

方志敏：哭声	179
郭沫若：月蝕	182
梦与现实	202
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	207
蔣光赤：在伟大的墓之前	220
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249
“怎么能……”	256
郑振鐸：向光明走去	261
离别	266
海燕	275
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281
朱自清：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四〕)	291
白种人——上帝的驕子!	297
許地山：落花生	303
冰 心：往事(七)	306
寄小讀者通訊(七)	309
振 鵬：端午节	315
W 生：谁是凶手	320
得 文：篇末	327

前 言

这个选本选取 1918 到 1927 年新文学最初十年間的散文作品。这十年間可以分做两个时期，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毛主席說：“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帶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論”）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的领导下，在散文方面，同样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后党又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二七”“五卅”等伟大的工人运动和 1926 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样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革命，要求在文学領域内得到反映。而散文較之其他文学形式，在反映现实上，是更为直接和迅速，这是因为散文形式自由、方便，不受拘束。鲁迅說“猛烈的攻击，”正是这个意思。当时的一些进步期刊，如“新

青年”、“晨报副刊”、“語絲”、“莽原”等积极提倡散文。“新青年”从四卷四期(1918年4月)起辟有“随感录”一栏,专登一些短论和杂感式的散文。鲁迅在谈到他编“莽原”时的情况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議論……所以,倘有近于議論的文章,即易于登出”。从这里,也可看出,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当前迫切斗争的需要,它是被当作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使用的。

五四时期散文发展的趋势大抵是这样的:在1918年到1921年間,它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当时以“新青年”为中心,成为反封建斗争的最激烈的前哨阵地,在这里经常发表文章的有李大钊、陈独秀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1921年以后,由于革命的深入和党对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期刊增多了,散文作者队伍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更丰富了,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散文也逐渐增多了。

二

我們这里所指的散文,是包括杂文、散文诗以及记事抒情等散文而说的。当时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作家,首推鲁迅和瞿秋白。

鲁迅在本时期的散文著作,印成集子的計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續編”、“而已集”和《集外集》中的一部分;散文有“朝花夕拾”;散文诗有“野草”。

鲁迅的杂文是很多的,它的杂文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

会原因的，瞿秋白同志分析得好，他說：

魯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論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通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魯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点是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魯迅杂感选集”序言”)

魯迅本期的杂文，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无一不起了匕首和投枪的战斗作用。它集中地攻击了封建传统思想，洋奴买办文化思想和封建統治阶级及其帮凶。早在1918、1919年間，魯迅写了“我之节烈观”，“我們現在怎样做父亲”和几十則“随感录”。这些杂文，主要是猛烈地攻击封建主义。例如在“随感录四十”中，魯迅尖锐地抨击封建礼教的买卖婚姻的罪恶，指出封建婚姻的种种恶果，喊出：

我們不必学那才从私窝里跨出脚，便說“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帳勾消的時候。

舊帳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這種要求解放的呼聲，正是五四的時代聲音。

波瀾壯闊的五四文化革命，引起了主張保存國粹、尊孔讀經的封建復古主義者的極力反對，如嚴復、林琴南等用各種形式詆毀新文學運動。林琴南在1919年3月，寫信給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反對新文學“復孔孟，鑄倫常”，尤其痛恨新文學的形式——白話文字，反對“盡廢古書，用土語為文字”，他認為土語（就是白話）可寫作品，則“京津引車賣漿者流”（勞動人民）也可當教授了。

對於這些封建余孽，魯迅給予了猛烈的反擊，他深刻地解剖了“國粹”、“倫理”、“禮法”、“貞節”等封建禮教的危害性，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主義者：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同下）

並且辛辣地嘲笑那些妄想打倒白話文，提倡文言文的，以為：

最可嘆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里說的君子國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

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热风，随感录五十七”）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进展，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右翼），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转为反动。如胡适、陈西滢之流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公开和封建复古派同污合流，忠心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效劳。例如胡适曾说，“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他并在1922年创办“读书杂志”，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主张青年多读经书；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在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公开宣传洋奴买办文化思想，为帝国主义侵略作种种辩护。如陈西滢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应该被帝国主义侵略而不做声；徐志摩把人民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说成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三一八惨案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中竟把封建军阀政府对爱国青年的屠杀，说成是青年们“自蹈死地”。最卑劣的是这些人还扮着公正的学者面貌，自认为是青年导师。

鲁迅在1921年以后的许多杂文，正是针对着这些欧化绅士们的思想进行斗争的。他在“一点比喻”中比喻这些文人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铃鐸，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意思是说这些文人担当着领队的“山羊”角色，企图领着中国人民乖乖的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进行屠

杀！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这些御用文人的帮凶本質。在魯迅其他許多篇杂文中，不断揭露这些反动文人的面目，比喻他們是“吸人的血还要預先哼哼地发一通議論的蚊子”，“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这种揭露和斗争有着巨大的战斗意义，瞿秋白同志正确地評价为“揭穿这些卑劣，怯懦，无耻，虛伪而又残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目，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陣綫。”（“‘魯迅杂感选集’序言’”）

关于魯迅杂文的艺术特点，他自己曾說过一句很中肯的話，“論时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类型”；这話不但說明了魯迅杂文的战斗意义，每篇都是对“时事”有感而发，是言之有物的东西；而且也告訴我們，魯迅在写作杂文时是用“取类型”的方法，也就是說他所諷刺的对象，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每一类型的刻划，給我們以生动的形象化的感觉。

本来，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形象来感染讀者，这在小說、戏剧中表現得最为明显。作为杂文來說，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杂文带有社会評論的性質，作者对社会現象直接发表言論，它更多的需要是邏輯严密，說理性强。五四以来許多的杂文，从政論这方面来看，确也犀利深刻，但往往缺乏形象性，它們是更接近論文形式的。魯迅杂文除了具有上面所提到的杂文特色之外，还具有一般杂文所不能企及之处：形象性强。魯迅在許多杂文中总是用概括的手法，以形象来显示事物的特征。例如在“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中，把帝国主义的走狗、紳士階級的买办文人描繪为：“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状可掬，

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真是神肖极了。对于这种取类型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毛主席曾說：

他用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簡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鲁迅逝世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說”）。

确实，在鲁迅的照妖鏡下，黑暗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鬼脸是原形毕露，显示了全部的丑恶。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除了形象性强以外，还具有辛辣地諷刺和幽默风趣的特点。尖刻处就是鲁迅所謂“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書”十二），抓住論敌的重要之点，給以致命的一击。幽默处就在于无情地解剖現象和敌人之后，显示出作者对丑恶的現象或論敌的高度的蔑視，使讀者在不知不觉中会产生胜利的微笑。而这些都是和鲁迅深刻的思想分不开的。

新文学中杂文这一形式，能成为我們文学中战斗性最强的輕騎兵，那是和鲁迅的劳績分不开的。鲁迅独創的这种杂文，短小精悍，鋒利尖銳，幽默生动，战斗性极强，对新文学中的杂文发展有着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鲁迅的散文詩集“野草”，一方面，反映着他坚韧的战斗精神，例如在“这样的战士”中，鲁迅歌頌：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

也并不疲憊如中国綠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
灵于牛皮和廢鉄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
的，脫手一擲的投枪。

下面描述了这一种战士，永不屈服，不受敌人的欺騙，战斗
到死也要举起投枪。其实，这正是魯迅自己的写照。但另
一方面，也反映着他在战斗中寂寞、痛苦的心情。例如在
“希望”中說：

我的心也曾充滿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鉄，火焰和
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虛了，但有时故意地
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这里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在沒有成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
找不到出路时的消极、失望的一面。

基于以上的內容，“野草”中的許多篇文章都是憤怒、沉
郁和感伤交織在一起的。在形式上，“野草”是用优美的散
文詩形式，有一些篇章多用比較隱晦曲折的象征手法。我
們选录了比較明朗的“好的故事”。它用优美的文笔，描繪
了作者对美丽的理想的追求，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显示作者絢烂多采的艺术才能的另一方面，是叙事散
文“朝花夕拾”。这是一本回忆文字，魯迅用他最誠摯的感
情，回忆了他的父亲、先生、朋友、保姆，表现了对他們的熱
爱，“藤野先生”即是其中的一篇。魯迅的伟大，还在于即使
在这些回忆中，也决不是一味咀嚼着过去的生命，它們仍然
尽了匕首投枪的作用，只是換了另一种文学形式罢了。試
看“二十四孝图”、“无常”、“狗·猫·鼠”等篇里面，无一不閃爍

着反封建主义的鋒芒。例如在“二十四孝图”中猛烈地攻击了“老萊娛亲”、“郭巨埋儿”等宣揚封建倫理观念的毒害性。“藤野先生”中結尾的那一段，看来是三言两語，却点出了“朝花夕拾”的战斗意义。“朝花夕拾”在艺术上有它独有的风格：浓厚的抒情，文笔清新而瑰丽，每篇都是优秀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書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党的工作和实际的政治活动，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批評家和文学翻譯家。

这时期，他的散文著作有“餓乡紀程”和“赤都心史”两書，以及为数不多然而具有重大价值的几篇杂文。

“餓乡紀程”和“赤都心史”，是中国最早的記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同时也刻划了作者自己从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过程。“餓乡紀程”用游記形式，反映了自中国至俄国旅途上的所見所聞。写出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在人們經濟生活和社会心理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反映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尖銳斗争，歌颂了苏联革命的伟大。“赤都心史”是記叙作者在莫斯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在这本书中，約略可以分几种：杂記、散文詩、“逸事”、讀書录、參觀游覽記，真实地摄取了苏联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面影；同时也記錄了作者对新生活的感受。这两本书的文笔，深刻而清新，游記的特色和詩的情趣，交織在一起，构成了优美瑰丽的风格。

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杂文中，如“最低問題”，有对于封建

軍閥政府強烈的憎恨，表現了作者高度的愛國主義；“那個城”，則以近於小說的散文形式，用濃艷的筆觸，象征的手法，最早以文學形象指出中國革命的方向——走俄國革命的路。這些作品在我國新文學史上都具有不朽的歷史價值，它們是自覺地反映社會主義勝利的作品，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學的重要部分。

李大釗同志是我國最早接受並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也是黨的初期領導者之一。他在五四前後陸續發表了不少議論文字，這些文章中有的結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來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如“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有的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社會問題和文化史問題，如“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這些文章從狹義的文學定義來說，自然不屬於文學範圍；廣義的說，這類具有文藝氣息的政論文，也是可以當作散文作品來閱讀的。而且，這些文章在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上起過巨大的不可磨滅的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以這種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作為領導而發展的，李大釗同志是其中最傑出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

我們選錄了他在1918年10月寫的“庶民的勝利”一文，它尖銳地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廣大人民的勝利。文中對於未來的世界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預言：“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在作者其他文章中，也多次有過這種預言，如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說：